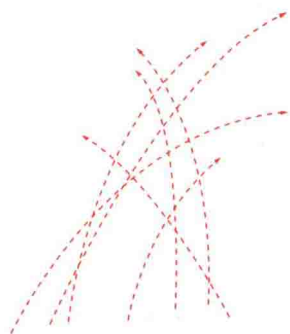


刘社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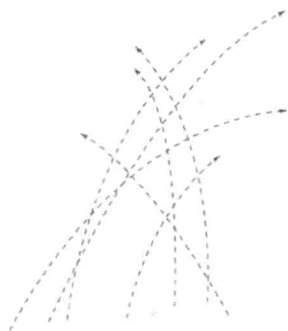
最终消费率与 经济稳定增长



Final Consumption
Rate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刘社建◎著



最终消费率与 经济稳定增长



Final Consumption
Rate and Stable
Economic Growth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终消费率与经济稳定增长 / 刘社建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2

ISBN 978 - 7 - 5473 - 1083 - 0

I. ①最… II. ①刘…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增长—
研究 IV. ①F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4949 号

最终消费率与经济稳定增长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1083 - 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提高最终消费率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	2
一、研究概况	2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率概况	9
三、生产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14
四、主要依靠投资难以有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18
五、提高最终消费率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23
第二节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28
一、主要观点及主要内容	28
二、存在的主要不足及未来研究重点	30
第二章 经济稳定增长的判断标准与经济稳定增长状况	31
第一节 经济稳定增长的判断标准	31
一、判断经济是否稳定增长标准的基本原则	31
二、判断经济是否稳定增长的总体标准	32
三、经济稳定增长的程度划分	36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稳定状况	37
一、根据经济稳定增长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是否稳定	37
二、经济稳定增长的总体判断	46
三、必须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49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支出	51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支出状况	51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状况	52
二、“三大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拉动	61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变动	66
四、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	70
第二节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变动状况	75
一、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76
二、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演变状况	78
三、不同区域的消费变动状况	85
四、扩大居民消费是发挥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 作用的关键	90
第三节 最终消费率变动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93
一、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与居民消费率的国际 比较	93
二、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为主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102
三、提高最终消费率的国际做法与启示	105
第四章 居民消费率变动状况	109
第一节 居民消费变动状况	109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居民消费变动概况	109
二、居民消费率的变动状况	112
三、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118
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122
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125
六、居民消费倾向与居民消费潜力	132
第二节 居民消费率变动的影响要素	134
一、影响居民消费率变动的主要要素	134

二、劳动者报酬份额与居民消费率变动	136
三、就业变动与居民消费率变动	147
四、劳动力用工成本与居民消费率变动	153
五、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率变动	160
第五章 东、中、西部最终消费率与经济稳定增长	167
第一节 上海经济发展与消费变动	167
一、上海发展概况	168
二、上海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 净流出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173
第二节 河南经济发展与消费变动	175
一、河南发展概况	175
二、河南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 净流出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181
第三节 甘肃经济发展与消费变动	182
一、甘肃发展概况	183
二、甘肃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 净流出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187
第四节 东、中、西部的消费变动与经济发展	189
一、上海、河南与甘肃三地的最终消费率比较	189
二、上海、河南与甘肃“三大支出”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比较	192
三、上海、河南与甘肃劳动者报酬份额与城镇登记失业率 比较	199
四、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与消费变动前景	202
第六章 最终消费率的合理区间	204
第一节 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204

一、进一步充分重视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的作用	205
二、经济新常态下必须有效提高最终消费率	209
三、持续提高最终消费率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211
第二节 最终消费率的合理区间	213
一、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最优消费率	213
二、确定最终消费率合理区间的基本原则	215
三、未来最终消费率的合理区间	218
第七章 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222
第一节 最终消费率变动的简要总结	222
一、双轨制下最终消费率的变动	223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最终消费率 变动	224
三、2000 年至 2010 年间的最终消费率变动	227
四、2011 年以来的最终消费率变动	231
第二节 最终消费率的发展趋势	232
一、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最终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232
二、有效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挑战	236
三、有效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机遇	241
第三节 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则与 战略	245
一、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总体原则	245
二、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措施	247
结语	253
主要参考文献	259

第一章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但受以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主要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拉动明显不足,难以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经济难以实现稳定增长,公众难以有效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科技水平难以有效提升、腐败频发等突出的问题。深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稳定状况以及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关系,对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使公众有效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为有效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有待在经济步入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正确认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真正确立以最终消费支出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理念,积极构建健全完善的以最终消费支出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采取综合措施,不断提高最终消费率,持续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拉动,以努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并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最终消费率,有效实现提高消费率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良性循环。

第一节 提高最终消费率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前提

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是以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率长期以来处于较低水平,当前最终消费率仍然较低。有待深入分析投资与消费在带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改变那种以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为途径不断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一、研究概况

在长期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重积累、轻消费”的生产方式通过有意压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并努力为赶超型的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均处于较低的水平,消费品供给也极为短缺。改革开放之初在反思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忽视消费导致问题的基础上,理论界逐步重视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并创立了消费经济学这一学科,对有关消费经济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消费的学者以及有关研究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之初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消费水平低下的反思与研究,对在改革开放后努力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并不断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随着经济不断增长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中逐步出现消费不足以及难以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较为突出的问题,理论界围绕如何有效扩大消

费、充分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也有研究质疑最终消费率过低是伪命题,但主流观点认为最终消费率过低并强调应该不断提升最终消费率持续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消费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消费的有关研究,对深入认识扩大消费中存在的问题与瓶颈,以及更有效地扩大消费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关于最终消费率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种观点也是最重要的观点,认为最终消费率过低,由此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为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提高最终消费率并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种观点认为最终消费率过低是个伪命题,最终消费率较低属于正常水平,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有关最终消费率的标准,不能通过不同国别的比较就认为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在第二种观点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并不是当前最终消费率过低,而是官方统计数据中给出的最终消费率数字由于多种因素较实际水平被大大低估,实际最终消费率远远高于官方的最终消费率数字,进而指出以提高最终消费率来推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或者是有害的,也有研究提出了重估最终消费率的方法并重估了最终消费率。

(一) 有关消费的相关研究

消费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对象,能否有效妥善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能否充分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对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具有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妥善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确保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平衡发展,是防止生产过剩与出现经济危机的必然前提(马克思,1867)。测算消费水平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函数后莫迪里亚尼等人(Modigliani &

Brumberg, 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 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是有关消费的最基本的理论分析基础,此后消费函数不断发展,包括随机游走假说(Hall, 1978)、预防性储蓄假说(Kimball & Mankiw, 1989)和损失厌恶假说(Shea, 1995)等,相关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消费的影响因素与变动趋势。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动态条件下市场经济效率的衡量标准是家庭长期消费效用最大化,即黄金律标准。根据菲尔普斯(Phelps, 1961)提出的标准,判断宏观经济增长是否最优的标准是家庭长期消费效用最大化,并要求一个国家各期家庭消费的效用总和最大化,即黄金律标准(Golden Rule)。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平衡增长路径上的均衡消费水平是帕累托最优的,即没有更好的平衡增长路径能够使家庭的长期消费水平得以改善,那么经济平衡增长路径就符合黄金律标准。

不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最终消费率是否具有一般的变动规律,是理论界关注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研究认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最终消费率变动具有一般规律即“发展型式”(Chennery & Sycquin, 1975)。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最终消费率变动情况大致呈现出“U”型变动趋势,即在经济较不发达阶段最终消费率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投资率的不断上升最终消费率下降,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公众收入水平的提升最终消费率重新趋于上升。而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从较发达水平国家到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最终消费率也大致呈现出“U”型趋势,即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终消费率较高,而中等发展国家最终消费率最低。但上述“U”型变动趋势只是一般性的规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严格遵循这种规律。东亚国家受传统偏好高储蓄、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的影响,虽然经历了较长时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普遍最终消费率较

低,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使得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动时经济增长即可能受到经济停滞的困扰。东亚国家中,中国低消费率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所得过低(Aziz & Cui, 2007 等),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停滞除了居民消费增长缓慢外政策误导也是重要原因(Horioka, 2006),东亚国家采取减税政策与汇率政策是提升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Feltenstein 等, 2007)。与东亚国家相反,长期以来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偏好消费并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的最终消费率是西方国家得以经济保持强劲动力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美国作为其中突出的代表,消费者超前的消费意识与消费水平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财产负效应与预期收入下降导致消费下降影响到经济增长,也有研究(Ivalyo 等, 2010; Nardi 等, 2011)对那种高消费的发展方式进行了反思,但一般认为西方国家较高的最终消费率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较为持久稳定的动力。

(二) 有关最终消费率过低的研究

国内理论界对有关最终消费率的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倾向于认为我国最终消费率较低,强调需要通过不断提高最终消费率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中国需求结构不够协调,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消费率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国家的最终消费率的水平(马建堂, 2011)。受经济增长方式、收入分配格局与社会保障体制等影响低消费率具有必然性,长期低消费率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发展(臧旭恒等, 2010)。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的现象是中国过去以来一直以投资为主驱动的增长方式的结果,这种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最终消费率(吴敬琏, 2010、2011)。最终消费率过低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失调,其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落后以及政府对经

济的过度参与(姚洋,2010)。其他研究中,迟福林(2011)、万广华等(2001)、方福前(2009)、汪伟(2009)、程令国(2011)、杨文辉(2012)、Bonham and Wiemmer(2013)等均指出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而最终消费率过低影响到经济的全面稳定可持续增长。虽然也有研究指出中国最终消费率可能被低估,但又指出最终消费率被低估的程度并不足以影响对中国需求结构失衡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判断(Perkins,2012)。

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提高最终消费率的措施,为扭转低消费率需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者报酬份额、降低预防性储蓄、推进城市化、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入手(吴敬琏,2009;陈昌兵,2010;宋国青,2007;方福前,2009;甘犁等,2010;范剑平等,1999等)。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存在一个最优消费率的合理区间,在此区间内经济才有可能保持稳定增长(刘迎秋等,2002;杨圣明,2005),也有研究计算出了最优消费率(吴忠群等,2011)。

(三) 质疑最终消费率过低的研究

与上述认为最终消费率较低的研究相反,也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最终消费率并不算低。有研究质疑消费率是否过低,认为消费率过低更可能是经济增长内生决定的低水平均衡(王雪峰等,2011;郭兴方,2007)。有研究指出,简单对各国的消费率进行比较并不存在理论依据,对最终消费率水平过低的担忧是缺乏依据的(罗云毅,2000、2004)。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脱离了一个经济特定的发展阶段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单纯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并不说明问题,发展需要投资为动力,高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张军,2005)。有研究强调最终消费率过低的必然性与客观性,指出作为具有典型后发性质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消费率是与其发展所处的阶段、发展水平及其后发要求相适应的,具有

客观性和必然性(朱锡平等,2003)。有研究认为,虽然中国最终消费率过低,但处于一个较低水平的均衡消费率,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经济运行中中国需求不足的现象似乎都不存在,认为实际经济多年运行的结果和部分学者的质疑说明,中国的消费率极有可能并不是简单的“高低”问题,而是与当前经济结构相一致的低水平的均衡消费率(郭兴方,2007)。

近期对最终消费率过低批评最严重的是朱天和张军的研究,他们认为消费率过低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三驾马车”理论和官方统计数据来计算的,指出最终消费率不但不低,而且认为最终消费率低属于误读。他们重新估算了最终消费率,认为最终消费率至少比官方给出的数据高了10个百分点(朱天和张军,2014)。

但朱天和张军(2014)对最终消费率低估的那种批评并不成立。所谓“三驾马车”是从通俗的角度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与重要作用,并不能从对“三驾马车”不是规范的经济学术语就得出判断最终消费率较低的前提不成立的结论。对投资的过度强调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问题,那种强调认为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有其一定道理,而批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缺乏经济理论依据的说法并不成立。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能由此忽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且“三驾马车”虽然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说法,但是作为一种约定俗成且通俗易懂、较为形象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强调中国消费增长率过高并不能忽视最终消费率过低的事实,并不能忽视发展的动力是高储蓄率所导致的问题。虽然朱天和张军(2014)指出了居民消费可能被低估,但纵然被低估也依然不能改变因消费支出低下而导致经济质量不高的事实,他们的计算并无足够的说服力证明消费率确实是被低估,而且他们的计算结果并不必然比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结果更为权威。虽

然存在住房消费确实被低估以及住房购买计入投资而非消费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并不足以说明最终消费率过低不是个问题甚至不是个严重的问题。目前并不存在真正的具有说服力的重新估算最终消费率的办法,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相关研究对最终消费率的估算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更加精确与权威。

而且张军等的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缺陷是,他们并没有区分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区别,他们认为两者是同一概念,而据此对最终消费率计算的质疑以及相关的推算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而在统计学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存在较大的区别。固定资本形成是指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两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包括土地购置费、旧建筑物购置费和旧设备购置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不包括这些费用,随着用地成本的增加,土地费用占投资的比重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只包括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项目的投资,不包括 500 万元以下项目的投资,不包括固定资产的零星购置;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既包括计划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项目的投资,也包括 500 万元以下项目的投资,还包括固定资产的零星购置。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包括商品房销售增值、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以及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这些价值。第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只包括有形固定资产的增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既包括有形固定资产的增加,也包括矿藏勘探、计算机软件等无形固定资产的增加(许宪春,2013)。正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存在一定的区别,而张军等在研究中并没有区分固定资产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差异,也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最终

消费率过低的质疑。

(四) 关于最终消费率是否过低的评论

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济稳定增长需要合理发挥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服务货物净出口的作用,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确保最终消费率保持在合理区间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然前提。虽然有研究质疑最终消费率是否真的过低,但这种质疑并不成立。最终消费率较低的关键原因在于受人力资本水平低下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劳动所得赶不上资本所得,劳动者报酬份额不断下降,导致公众消费能力难以有效上升,也是消费供给不足、消费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高最终消费率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必然前提,有待通过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构建不断提升劳动者报酬份额的体制机制,持续提高居民收入与降低预防性储蓄,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提高消费率的重点等一系列综合措施来实现。已有研究对探讨提高消费率与经济稳定增长的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也有待在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新常态的特点,结合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深入分析经济增长前景及存在的风险,考察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影响机理,探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优消费率的合理区间,积极构建以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机制,提出提高最终消费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措施。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最终消费率概况

以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最终消费率作为最终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反映了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程度,最

终消费率的水平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以及经济是否能保持稳定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双轨制经济体制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期最终消费率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自 2000 年来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①,尽管自 2011 年后最终消费率止跌回升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较低的最终消费率不但难以有效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应有作用,而且也使以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主要拉动要素的经济增长极不稳定,极易受到固定资产投入波动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变动的影响。

最终消费率自 1978 年至 2009 年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自 2000 年后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至 2010 年达到 49.1%^②的历史最低点。虽然 2011 年后最终消费率持续上升,到 2014 年最终消费率达到 51.4%,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在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拉动不断下降,而且波动较为剧烈。自 2000 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极低,大部分年份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2003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只有 35.8%,2003 年至 2007 年均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虽然自 2008 年起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也较为有限。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政府投资四万亿元的背景下,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有所上升,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自 2011 年后随着资本形成总额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难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有所提升,2011 年最终消费

① 2015 年中国统计年鉴对有关国内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率等数据作了较大调整,调整后的数据高于此前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本研究分析均以《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为准。

② 相关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5》及自行测算。